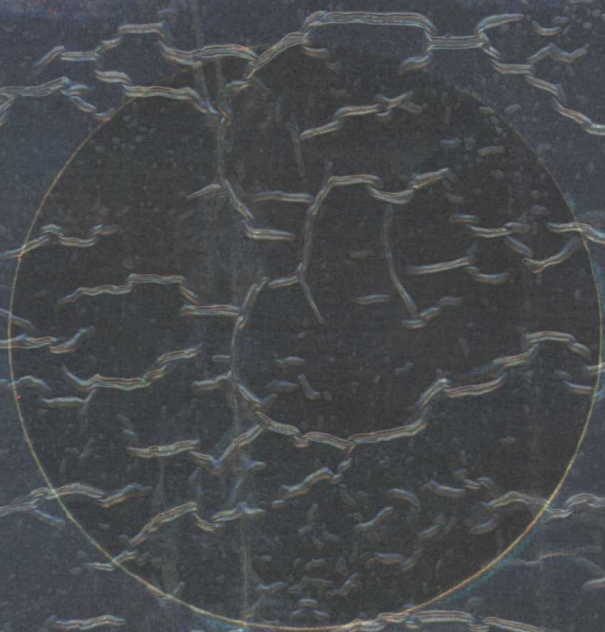


东郭先生 著

太監生涯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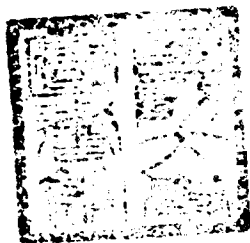


2 031 1126 6

太监生涯

东郭先生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

2 031 1126 6

太 监 生 涯

(台湾) 东郭先生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7 字数: 365千字

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0280—7

1·273 定价: 6.00元

自序

远溯宦官历史，在西方埃及的克丽具佩脱拉时，就已有雇用的纪录。而印度在孟加尔王朝，亦后宫拥有宦官数千。但其发展都没有中国的古老深远，信史亦达三千年之久，或以为宦官系由西方传入中土而“发扬光大”，惜无所据，不可遽信。然而，中国之有太监自有它发展的温室环境，正如动植物的孕育、滋生、茁壮以至生长，必有适宜之土壤、气候等培育条件的配合。

笔者翻检史籍，采摭征引的结果，认为女性权力高张，亦即母系社会在中国的残存遗留，尤其女性权力在宫廷斗争过程，因势利导地促成太监的风行。

远古的母系社会是种什么样子？男性角色所处之地位又为如何？今人讳莫知详。人类学家笔下描摹的所谓“母系社会”，不过是以“舅甥关系”代替了“父子关系”，谓权力结构仍掌握在男性手中。史料所及范围，男性一直是人类主权的支配统治者。但男性背后总有一个或更多的女人掌握操纵，“临朝称制”或“垂帘听政”也者，仅是殊例样板而已。

近世的女权运动者，希望达成以下之目的：

“我们宁愿退居幕后，掌握实权，暗中指挥！男人嘛！不但是甜点，而且是些傀儡”！

现代女性纷纷站起来，口口声声要抢夺男性权力。女权运动奇怪是也有男性参与领导，摇旗呐喊，随声附和。实际，在中国人而言，不过是历史回归，重返前代女性的老路吧了！直到清末民初，父母双亡子女分家的主持执行者，舅父是第一顺位，可见重视母权的积重难返。

近代人亦常常为古中国帝王宫廷嫔妃数目之伙，引起议论。如《周礼》规定：

“王者立后，三夫人，九嫔，二十七世妇，八十一女御，以备内职焉”。

前人指斥《周礼》为战国时人伪作，是“汉武末世涂乱不验之书”。周天子似不应该有“一百二十个女人”供伊独享。而无聊之士乃把周天子和这么多女人分配出一个“荐枕燕好”的日程表来。云：

“皇后一夕，三夫人共一夕，九嫔共一夕，世妇二十七人三夕，女御八十一人九夕。计十五日一循环，反覆行之”。

如此一来，皇后一月有两个晚上可与天子肉体接触，享受性爱之乐。而三夫人一夕外，九嫔、世妇、女御一百十七人之多，则仅十三个美丽的温存之夜。然而，周天子真有金刚不坏之身，每晚有这么多人分沾雨露，如《素女经》主张彭祖寿命千年，每夕御女数十百人之频率否？说来真是荒唐！而且，这个“性比例”数字，史文续有增加。如刘宋人范曄撰《后汉书》皇后纪第十上云：

“秦并天下，多自骄大，宫备七国（始皇破六国以诸侯及秦所得美人充入后宫）、爵列八品（正嫡称皇后，妾皆称夫人，又有美人、良人、八子、七子、长使、少使之号）。汉兴、高祖帷薄不修，孝文衽席无辩。然而，选纳尚简，饰玩少华。自武、元之后，世增淫费，乃至掖庭三千，增及十四。妖幸毁政之符，外姻乱邦之迹，前史载之详矣！……故孝、章以下渐用色授，恩隆好合，遂忘淄蠹！”

奇人杨森寿至近百，纳妾二十余岁，令光棍羨煞！我一次随杨同游七星山，伊人亲见及之。杨老爬山比我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还跑得快，确是神仙中人，我尝拍照留念。传说：杨森一生中妻妾逾百，儿女数不清。大概古代帝王的两性生活类此。当然，荒淫如金陵王、隋炀帝等玩弄作贱女性的事，不是没有。问题是女性在宫廷的人数和“合法”地位，秦汉之后仍有增长的趋势。由秦的“八品”，增至武帝之后的“十四级”，达三千的女性之众（而隋唐宫廷且不止数）。接着引起的现象是范晔所谓：“妖幸毁国之符，外姻（戚）乱邦之迹”。

前引文字所谓之“妖幸”，是说有些女人硬是不要脸地如“成人电影”中数女争事一夫，抢着吞吃阳具般恶心。这一现象，尚不完全是女多于男“性比例”分配不足问题。而战争及英雄崇拜，以及尚古先民仍是牧猎肉食（真正的五谷蔬食，应汉通西域之后），如今日阿拉伯、蒙古人生活习惯为近。各种因素导致过多女性依附男性生活，而女人一多，花样就多，争风吃醋是小插曲，几乎任何事都可以做得出，“妖幸”之事乃生。王祯和小说改为电影的《美人图》，颇

可说明此一人性发展。现代一夫一妻制成长的女性，实在无法理解古代女性，认为无上的屈辱。但女性要控制男性，伸张权力触角，用“性”与“色”讨好男性是最便捷的手段。

范晔记述历史，讲到“妖幸毁国”，紧接下一句就说：“外姻乱国”颇有深意而近情。《皇后纪》更指出一个事实：

“东京（东汉）皇统屡绝，权归女主。外立者四帝，临朝者六后”。

“现代女性”看到这段史文，应该“颇以为慰”。自秦代宫廷中已有三次以上的“宫变”，非太后摄政，外戚称侯夺权起，高祖时吕后之嚣张地杀大臣、彘戚氏、废太子，立诸吕而王，史文中特详。嗣有窦、王诸氏，直到东汉的“权归女王”，都表演出宫廷女性假托帝力所诉求的终极目标，几乎全部实现。这些史实的风云变幻背后，表面上是女性为男性泄欲对象，纯属玩物（如赵飞燕），大大的不平等。实际上则“女权高张”，女性在众多同性中始有拓展权力的余地。

近代心理学家有一新发现：女人化装打扮并非为男性“悦己者容”。而是在同性中表示“我比你漂亮”以求获得特殊的权力地位。自然，女性的权力结构也包括了有价值的男人。因此，新闻传播媒体把青春玉女剥待一丝不挂，裸裎于男人的色迷迷眼睛之前，并非男人都是色中饿鬼，前提是伊人肯出卖色相才行。

历史上的“外戚”、“女祸”欲从男性帝王手中夺获权力，最易借重而可利用者，则是身边供役之人的太监。这些不男不女仅“减死囚一等”的可怜虫，可以穿针引线发挥其可善可恶的“中性”人格。《后汉书·宦者列传》云：

“中兴之初，宦官悉用阉人，不复杂调他士（东汉之前乃亦有不是‘官刑’的宦者）。至永平中，始置员数：中常侍四人，小黄门十人（此指有官职者，服役则不止此数）。

和帝即祚幼弱，而窦宪兄弟（外戚）专揽权威，内外臣僚，莫由亲接，所与居者，唯阉宦而已。故郑众（肃宗时宦者，由小黄门位迁中常侍。和帝初加位钩盾令，斯则宦中禁军首长之任）专谋禁中，终除大憝（指窦氏戚党）。遂享分土之封，超登官卿之位（任大长秋），于是中宦始盛。”

汉代宦者发达之始，倒不是母后及外戚占了上风，而是皇帝借重宦者消灭了外戚党羽。因此擢升位至宦中首长的“大长秋”。“宦中”和“府中”颉颃争衡，大长秋和“府中”首长宰相，取相对平等的地位。中国史家写述历史事件，是站在男性的观点作为“正统”。女性事件则视为夺嫡篡位的“女祸”，处于反面角色。有些女性贡献国家，仅付与“贤淑”之名。故而古代宫廷事件，读史时只能就侧面去窥测究竟。请再看下列文字：

“邓后以女主临政，而万机殷远，朝臣国议，无由参断帷幄，称制下令，不出房闼之间。不得不委用刑人，寄之国命。手握王爵，口含天宪，非复掖廷永巷之职，闺牖房闼之任也。”

自此，太监开始了崭新的历史生命，在各代扮演种种翻云覆雨的大事件。固然，有功国家的宦者不能说没有，只是坏者多。总结其生涯，则多半是祸国殃民的魅首，集人类悲剧之大成也。

中国古代“男风”极盛，今日名词叫做“男同性恋”，汉朝每个皇帝都有一至数个美男作为性爱对象，并且记入正史，史家殊不为羞，大概如美国的“同性恋合法化”。史载高帝的藉儒，惠帝的闵儒，文帝的邓通、赵谈、北宫伯子，景帝的周仁，昭帝的金赏，武帝的韩嫣、韩谈、李延年，宣帝的张彭祖，元帝的弘慕、石显，成帝的张放、淳于长，哀帝的董贤等。而其中最著特色的是这些美男多数是宦者，以后地位显贵，仍扮演着这一“性逆转”角色。这里述及宦者作为同性恋对象，是说明宦者地位在开始极度卑贱下流，以后地位显贵，始成为一有组织具团结意识的特殊族类。

受过腐刑的阉人，是否容易成为男人同性阉的对象，历来意见极不一致。性心理学家艾礼士引述过德国希尔弗尔特在“同性恋”书中申说到“阉寺现象”（eunuchoidism），和同性恋没有绝对地连带关系。但艾礼士不以为然。尝举例反证（见所著《性心理学研究第二册性的逆转》）。太监不论是刑人或自官，都有女性化倾向，已不容否认。近二三十年动物实验者如德人汤德勒(Tandler)、格洛士(Gross)，及黎泼休兹(Lipschultz)，都说已经阉过的动物并不牝性化或雌性化，而成无性化，看上去依然公是公的，母是母的。西班牙动物权威麦拉南(Maranon)则认为这是一个错误，因为动物和人并不相等。而且，就在动物中间，一只阉过的公鸡也会被其他公鸡认作母鸡，从而作交尾的尝试。且阉过的公鸡亦时常作孵蛋的姿态，显然具雌性化倾向无疑（详见氏著《性的演化与间接状态》一书）。就动物实验以观，太监之有女性化作为帝王的爱宠，是其历史生命的原始发展。

《汉书》有《佞幸列传》，至范曄的《后汉书》则改为

《宦者列传》，同性恋的事件在正文里已不多见，特别是在六朝以后。一方面是人性升华，笔舌下鄙弃肉欲，伦理观念抬头，史家不愿写此浪掷笔墨，造成人世的精神污染。再方面则由于太监本身成了气候，尤其东汉之季，不惟政治上获得权力，爪牙遍布，史家犯不着文字肇祸。而且，宦者确已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，盖汉时宦者有不少是“功在国家”的人，如郑众、蔡伦、孙程、曹腾、吕强等是。故而，笔下亦“仕宦”或“宦宦”之家连称，成为中国人文政治的一个异数。

中国宦官为祸，以东汉、唐、明三代为最，然亦有其不同面目，母后权重固其根本，政治背景之不同尤为显然。东汉自窦、邓二后树党植权以来，宦官因此坐大，前已略言。而宦官势力之成长是渐进方式，可于下列史事层次中见之：

和帝亲政，宦官与朝臣相倚为奸，尚未敢藐视朝臣也。如宦官李闰、江京、樊丰、刘安、陈达与皇帝奶妈王圣，圣女伯荣（此二级宫廷女性之权力高张也），帝舅耿宝，皇后兄即皇帝大舅子阎显等比党乱政是。

和帝崩，皇后兄阎显欲去宦官樊丰、王圣等，乃与江京合谋，是朝臣欲去宦官，须藉宦官之力也。

北乡侯入继大统，寻薨。阎显又欲援立外藩，宦官孙程不予支持，并迎立顺帝，先杀江京、刘安、陈达，并诛徙阎后及显等。是大臣欲诛宦官，必藉宦官之力也。

顺帝既立，以梁商女为皇后，商为大将军辅政，尊亲莫二。而宦官张逵、遵政、石光、蹇商与中常侍曹腾（曹操祖父），孟贲云欲废帝。帝不信，逵等矫诏收缚腾、贲。是竟敢违帝旨肆威禁中矣！

帝崩，梁后与兄翼迎立冲帝，帝崩又立质帝，质帝为梁

冀毒杀。复立桓帝，并以后妹为帝后，自为大将军辅政，两妹一为皇太后，一为皇后。乱伦之形成主要是争取女权。母舅梁冀权高震主，桓帝乃默与宦官单超、左悺、具瑗、徐璜、唐衡等定谋，诛杀梁冀。是宦官且有力诛杀手执国柄之皇亲，然仍奉帝命以成事也。

桓帝梁后崩，又以窦武女为皇后，帝崩，窦武与后定策立灵帝，窦后临朝，武入居禁中辅政。素恶宦官欲杀之而后快，且有太傅陈蕃同心定谋，事不密，反为宦官曹节、王甫等所杀。灵帝非太后亲子，故曹节等得以挟天子命以行事也。

灵帝崩，何后临朝，立子辩为帝，后兄何进以大将军辅政。已而，奏诛宦官蹇硕，收领八校尉兵，是朝权兵权皆入舅氏何进之手，以此尽诛宦官。又有何难？但最后仍死于宦官张让、段珪之手。时天下大乱，继而袁术、闵贡等乘乱入宦，大杀宦官二千余人，宦官之局结束，东汉亦随之而亡。

唐代宦官之权，反在人主之上，立君弑君如同儿戏，实古今未有之变。故宦官之祸亦视东汉及前明为烈也。推究其原因，总由于使之掌禁兵，作监军、主管枢密，太阿倒持，授之以柄，故其势焰形成，虽有英明君主，忠辅察相，亦无如之何也矣！

玄宗时，高力士虽不是奸宦，但唐代宦官贵幸显重以此人为始，幸进者愿一见之难如登天，肃宗作太子时亦以兄事之。诸王公全呼之为翁，戚里诸家尊称曰翁，将相大臣诏命更多出于高的栽培汲引。

李辅国贵幸时，人不敢斥言其官，呼为“五郎”，矫诏迁上皇于西内，忧郁以终。而鱼朝恩忌郭子仪功高，潜罢其

兵权。程元振潜来瑒赐死，李光弼遂不敢入朝。又潜裴冕，罢相贬施州，以致方镇解体，吐蕃入寇，代宗出奔，征诸道兵无一至者，这尚是宦官不掌兵权未管枢要以前之事。

德宗惩泾师之变，禁军不集，还京后不欲以武官典兵，乃以神策，天威等军置护军中尉、中护军等官以内官宴文场，霍仙鸣等主之，于是禁军全归宦寺。又凡承受诏旨，出纳王命，多委之枢密，复为宦官掌领。二者皆极重要，有其一已足树威揽权挟制中外，何况二者？开始还只是扶主势以制天下，其后居肘腋之地，为腹心之患，人主废置亦尽在掌握之中矣，故唐自穆宗以来八世君王，宦官立者七君。汉代尚是依赖母后外舅的女权力量滋长茁壮，自此则自成族类，官府内外尽入掌握。但唐代宦官命运与东汉略同者，朱全忠入京先杀中官七十余人，诛党羽百余，及第五可范以下八百人，哀号之声闻于道路。诸道监军宦者亦令所在赐死，其惨尤不减于东汉末之诛杀宦官。然而、也同样的宦官完了，李唐天下也完了。

唐代女权之高张，武则天夺得了帝权，杨贵妃则将此一盛世未有的开元之治，由唐室极盛推送至衰弱的渊底。此外，唐代女性有名，且成为中华民族标准女性之代表，绝非偶然。而史家赵翼则谓“唐以女色起，以女色败”，盖有以也。

唐史另一可述者，即汉帝好男风，唐皇喜丹药。男风主要是以宦官为事，唐皇吃药壮阳的供给传达者，则仍是太监。

古诗云：“服食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”。服药求仙，在中国医典中是一特殊系统，可成专著。自秦皇、汉武之后，

魏晋六朝更流行于士林知识分子中。服石戕生，人所固知，但唐代皇帝几乎大半死于吃药，英武圣君不免以身试之，至死不悟。

《旧唐书》太宗本纪云：

“贞观二十二年，使方士那罗迺婆娑于金阙门造延年之药”。

又高士廉传云：

“高士廉卒，太宗将临其丧，房元龄以帝饵药石，不宜临丧，抗疏切谏”

其后，高宗将服胡僧卢伽阿逸多的丹药。郝处俊切谏，谓太宗服药无效，大惭之际高医束手。以后李藩亦谓宪宗曰：“太宗文皇帝服胡僧药，遂致暴卒不救。”是知英明如唐太宗竟服丹药而死。然而宪宗不之信，又惑长生之谈，服了方士柳泌、僧大通的金丹，燥渴暴怒，火毒攻心以死。

穆宗即位，柳泌、大通赐死，深恶金石。未几，则听僧惟贤，道士赵归真之说亦服金石致死。敬宗时，道士刘从政说以长生久视之术，冀获异药。武宗在东官时已好修摄道术之事，即位又召赵归真等八十一人于禁中炼丹服食，肤泽日消，药发燥甚，喜怒不常，疾笃时旬日不言而死。宣宗亲见武宗之死，然即位后又服太医李元伯长年药，病渴燥疽发背而死。此唐代六君，穆、敬昏庸，尚不足怪。而太、宪、武、宣四宗皆英明之主，甘心服药殉死，殊不可理解。武则天亦服食张昌宗兄弟所合丹药，却寿至八十一，实是异数。古人认为女体本阴，不象男性服燥烈丹药，以火助火，致水竭身枯而死。

唐代宦者另一掌权的原因是，多数太监寿命极长，皇帝

又多短命。如高力士、李辅国、郑众、仇士良、刘季述、杨复恭等、皆寿至耄耋，而历事数帝。一些皇帝在幼弱时，已在太监权力阴影之下，又复为此辈拥立，入承大统。故太监势焰形成，进而有其特殊族类的手法传统。

明代宦官之盛，视东汉晚唐之不同者，在于人数众杂，爪牙深入社会各角落。而且自郑和、侯显出使，王振、刘瑾任司礼监，设立东厂特务组织以来，代天行事，权势不轻。以迄魏忠贤的生祠遍天下，世无其匹。然明代太监决不敢象唐代宦官的任意废立太子，玩帝王于股掌之上。这点可分两方面介述。

一是明代太监势力充斥地方，爪牙遍布。明中业以前不过是阉党与政治结合。开始于王振劝帝（英宗），“用重典御下，防大臣欺蒙。于是，大臣下狱者不绝，而振得以市权”（见《明史》王振传）。而曹吉祥夺门移官，扶英宗复辟，遂至“门下厮养官员，多至千百人”。韦力转且“僭用金器若王者”。曹钦更名言有：“自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者乎？”至汪直之徒提督西厂，屡兴大狱，锦衣遍天下。“自王府边镇及南北道，所在校尉罗列，民间斗骂鸡狗琐事，辄置重法，人情大扰”！酷刑考讯，有“三琶”之刑，“三琶者，锦衣酷刑也，骨节寸解”（以上见汪直传）。汪党尚铭：“闻京师有富室，辄以事罗织，得重贿乃已。卖官鬻爵，无所不为”。而梁芳之流“贪酷谀佞……取中旨授官累千人”（见梁芳传）。孝宗弘治间李广利则“以待篆祀盥，因为奸弊”。并且“矫旨授传奉官，……四方争随賂，又擅夺畿内民田，专盐利巨万”（见李广利传）。

到了正德间的刘瑾，太监主持的厂上特务成为政治的主



流，《明史》列传三〇六云：

“至刘瑾窃权，焦芳以阁臣首与比之，于是列卿争先献媚。而司礼之权，居内阁上。”

同时，刘瑾乘间“专擅威福，遣党分镇各边”。“邱聚、谷大用提督东西厂，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，魏彬督三千营，各据要地”。进而“其党又边塞屯地，诛求苛刻，边军不堪（以上见武宗本纪）。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之点，就是太监权力走出宫廷，魔爪伸入了地方社会，这是明代太监可畏处。由于施展触角，广布爪牙，因而太监人数众多杂超迈前代了。

万历年间，“将疲于边，赋江于内”（见神宗本纪）。明廷为了支付国内外战争及齐醮宫殿营建的庞大费用，太监乃加强搜刮民财，大逞淫威。《明史》云：

“（万历）二十年，宁夏用兵费二百余万。其冬，朝鲜用兵费，首尾八年，金七百余万。二十七年，播州用兵费，帑金二三百万，三大征踵接，国用大匱。而二十四年，乾清、坤宁两官灾。二十五年，皇极、中极三殿灾，建营之费，计臣束手。”

搜刮民财之法，则是地方厂监的收入。明史记载有各地“矿监”。通都大邑，皆有“税监”，两淮有“盐监”，广东有“珠监”。于是大小太监走出京都，专遣兼摄，纵横绎骚，吸髓饮血，以供进奉。然入公帑者不及什一，而天下骚然，生灵涂炭矣。

“矿监”派出有名者如王亮、田进、王忠、王虎、曹全、刘忠、赵钦、张忠、鲁坤、李凤、李敬、杨紫、高淮、潘相、高寨、陈奉等遍中国。此辈假公济私，杀人越货，无

悉不作。《明史》食货志云：

“假开矿之名，乘间横索民财，陵辄州县。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，逮问罢黜。时中官多积暴，陈奉尤甚。富家巨族，则诬以矿盗。良田美宅，则指为下有矿脉，率役围捕，辱及妇女。甚至断人手足，投之江，其酷虐如此。”

又《续文献通考》征权篇云：

“矿头以赔累死，平民以逼买死。矿夫以倾压死，以争斗死！”

“税监”如陈奉、马堂恶名昭著，《明史》陈奉传云：

“自江南至浙江，大作奸弊，称奉密旨，出金宝募人告密，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，所破什百家，杀人莫敢问。”

又云：

“（陈奉）兼领数使，恣行威虐，每托巡历，鞭笞官吏，剽窃行旅，商民痛入骨。……其党至直入民家，奸淫妇女，或掠入税署中……以至仕民公愤，万余人甘与奉死。”

天津税监的马堂，兼领临清税监。临清是昔日北运河入口，地处繁盛，不下于扬州。《金瓶梅》即以此地为中心地理背景，故事中有许多太监，似即以马堂等作为张本。马堂传云：

“始至（临清），诸亡命数百人，白昼手银铛夺人产，抗者辄以违禁罪之。僮告主者，畀以十之三，中人之家，破者大半，远近三十七人，皆黥臂诸偷也”（以

上参见翦伯赞撰《中国史论集》论明代的阉臣一章）。

尽管如此，但明代太监亦并未动摇国本，且“明之亡始于神宗”，不象汉唐末世的宦者。原因是明代的政治背景有其特殊之点。兹分述如下：

1. 明太祖行事多仿汉高祖，定都金陵后实江南富民十四万户，兴建壮丽宫阙，犹如萧何之起造未央宫，徙齐楚大族实关中故事。而分封朱氏及异姓子弟，兴胡、蓝之狱、文字狱、虐杀功臣文士，又皆效法刘邦之狠毒手段也。而明代帝王的性格遗传，一如乃祖，故成祖、正德、嘉靖、万历等帝，虽重用太监，然不敢逾越非分，招致杀身之祸。

2. 明代吏治清明有足称者。按说明代官吏俸禄最低（相反地封王子弟待遇则太优厚，末造又极穷困），然多能洁己爱民，澄清吏治有近三百年天下者，有下列原因：

① 重惩贪污，罪至剥皮实草之刑，太监亦然。

② 时遣大臣及巡回御史考察官常，出守廷臣复兼有德望者充之。而御史监察权之行使，尤为我国民主政治之蓝本。虽然，明代帝王皆以专制残暴著称。

3. 特别是用人惟贤，宰辅大臣能久安任职，构成安定政治的核心力量。使宦者未敢逾分。如杨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，金幼孜三十年，杨荣三十七年，杨溥二十二年，六卿中蹇义为吏部尚书三十四年，夏原吉为户部尚书二十九年，胡濙为礼部尚书三十二年。朝廷之上慈眉白首辉映，中外翕然。而张居正于万历时亦相位至十八年，挽明室于不堕。当国势衰替时史留恶名者如：万吉为相亦十九年，刘吉为相十八年，严嵩且二十一年。此外较次要的能臣而有贤名者，如黄淮、胡广在位十六年，李东阳十八年，徐阶十七年，吕震十九年，马文升二